



社會史研究
之六

山西水利社会史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史研究

山西水利社会史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水利社会史/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2

(历史与社会·社会史研究)

ISBN 978-7-301-10419-4

I. ①山… II. ①山… III. ①水利史-山西省-文集②社会史-山西省-文集
IV. ①TV-092 ②K2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0475 号

书 名: 山西水利社会史

著作责任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高海云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0419-4/K·09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mm × 1020mm 16 开本 17.5 印张 310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社会史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编 行 龙

编辑委员 郝 平 张俊峰 胡英泽 韩晓莉
马维强 常利兵 李 嘎

本辑责编 胡英泽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简介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2001年3月。

198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继承老一代学者的学术传统,与海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合作,开展了多个项目的研究,努力把握当代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把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取得显著成绩。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立足于对中国社会历史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实证性专题研究,注重透过区域的整体去理解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一个较小地理单元的经验事实出发,可以深切感知一个具体的社会是怎样组织、延续与变迁的,从认识上、方法上推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强调在田野现场解读文献,注重不同类型的文献(如正史、政书、地方志、族谱、碑刻等等)、口述资料、仪式活动等所蕴含的不同历史表达,并力求这些不同的历史表达整合在一起,以期呈现富于立体感和整体性的历史。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出版了《历史·田野丛书》和《清水江文书》等标志性成果,在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等学术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探讨建立中国地域社会历史新的解释框架的可能性,并由此回应国际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面对的各种重要问题,力图对历史学、人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有所贡献。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一直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中心一成立,就开始招收历史人类学方向博士研究生,随后又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历史人类学博士生培养专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招收博士研究生16名,已授博士学位3名,其中1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以来,中心研究人员指导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有许多已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取向。同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还同海内外多个机构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大学

生暑期研习班等。

本中心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年,积极发展与海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多家大学等建立了多方面的合作关系,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的方向下,利用香港、台湾作为国际合作桥梁,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本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均已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共同承担研究项目,共同主办各种学术活动,共同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和其他著作。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向境外学术基金会成功申请的“在边境的社区:华南侨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网络比较研究”研究项目和香港研究资助局(RGC)项目“重新定义西江——明清帝国的构建与土著社会的演变”,均是以香港为基地,由中国、欧洲、北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多所大学的学者共同开展的合作研究计划。2009年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成功申请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设立的“卓越学科领域”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是目前香港最高层次的研究资助中唯一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年在教育部社科司的支持下,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作为本基地在香港的延伸机构,为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海外合作新机制走出了实质的一步。

本中心作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开放平台,除了吸收不同机构的学者加入中心的研究队伍外,还将通过在不同地区设立田野工作站,同地方研究机构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设立或正在筹划设立的田野工作站或博士后研究基地的地区包括了云南大理、广西、贵州锦屏、广东开平、广州南沙等等,中心将努力把这些工作站(基地)建设成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中心组建之初,就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也重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心成员曾参与世行公路项目II移民安置和社会评价工作培训、江西省综合农业现代社会评估培训班、中国西部畜牧业综合发展计划等,以人类学研究“参与式发展”的理念,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本中心为国家宗教局和广东省民俗宗教委员会制定国家民间宗教信仰管理政策提供咨询服务,承办东莞展览馆“珠三角盐业与城市的发展”项目、中山博物馆“中山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博物馆陈列设计”项目,完成“珠海历史文化名人乡土口述史料”项目研究,出版研究成果《关于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

目前,中心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香港出版两

份学术刊物:《历史人类学学刊》(半年刊)和《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季刊),两份刊物均已经在海外有很好的声誉,未来几年,中心将努力,将学刊办成具有更大国际影响力的刊物。中心重视中国民间文书和地方文献的收藏与研究,目前已开始的工作,如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与侗族的山林契约的征集与研究,清代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旗档案的研究与出版,湘西苗族、土家族文献的收集和研究,河北蔚县碑铭的收集与研究,潮汕地区碑刻拓印和出版,山西碑铭的收集与出版等。

在今后的建设中,中心将继续推进学术实践,通过重组研究团队,调整研究方向,探索和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以资料积累为核心的学科基础性建设方面,要建立独具特色的民间文献的数字化收藏,完善关于民间文献整理与解读的系统方法;在实证研究方面,继续拓展和深化本中心具有传统优势的中国西南及华南的区域与族群研究,同时将研究区域向华北、华中、江南和东南亚地区延伸,拓宽学科领域与研究视角,在地域社会建构、移民与族群问题研究、民间信仰研究等主要的课题上,取得突破性和创新性的成果;在理论探索方面,要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在比较和综合的区域研究中,凝练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初步建立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解释体系;在社会服务方面,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见解,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中心网址为:<http://ha.sysu.edu.cn/>

目 录

专题论文

- 何以研究明清以来“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行 龙(001)
- 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禁伐
- 以晋中、晋南为中心的考察 邱仲麟(007)
- 明清山西稻作种植:“用水极大化”的尝试 张继莹(040)
- 引渠用汲:明清黄土高原日常生活用水研究 胡英泽(083)
- 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
- 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 周 亚(105)
- 1950年代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
- 以《山西农民》为中心的考察 韩晓莉(123)
- 从水权看国家与村落社会的关系 祁建民(138)
- 山西翼城乔泽庙金元水利碑考
- 以《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为中心 井黑忍(152)

学术评论

- 二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张俊峰(163)

资料选登

- 山西、河北日常生活用水碑刻辑录 胡英泽(188)

何以研究明清以来“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行 龙*

2007年8月,笔者有一本小书《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实,那只是前些年撰写的有关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四篇学术论文的小辑,很难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最近几年来,晋水流域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引起我的思考,也有进一步系统探讨进而成书的欲望。整理思绪,现将这一选题的三个相关问题付诸文字,以为求教。

一

为什么是“明清以来”?我们知道,按照传统中国史研究的分期,明史、清史都是断代史,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年代是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建国以来,无论是形形色色、不同时期的中国通史,还是薄厚不等、不同地区的各类地方史,1840年都是古代与近代分期的标志性年份。这样的历史分期在1950年代曾引发过一场学术大讨论,至今仍有不同的声音。眼下区域社会史研究兴盛,更多的实证研究对此分期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区域社会史对传统中国历史分期挑战的一个学理层面的基础,是历史研究视角的不同,或者说是视角的转换。我们不能否认,传统中国史研究更多地是从政治史的视角考察社会变迁,上层统治人物的更迭、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通史的主干,这就是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历史。社会史则注重“自下而上”、总和的、全面的历史。一上一下,自然难有契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在多民族长期冲突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都表现出了不同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其历史的阶段性自然

*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也有不同,这样的认识也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但著述中往往没有很好地践行。以一个全国统一的分期框架解释所有地区的历史,显然也有难以契合之处。笔者以为,区域社会史研究也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区域史不能单纯以政治事件为标准,也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而要赋予区域新的时空概念。^① 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当从区域社会发展的实际和特性出发确定其分期,根据其具体研究对象(具体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发展变迁过程确定其分期,如此才能对区域有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把握。简单地将传统中国通史的分期搬用或套用到区域社会研究中来,往往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具体到晋水流域,甚至扩大到山西的历史,我以为明代初年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分期点。以往学界讨论历史分期问题,多以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而且多以生产关系的讨论为主,这当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对社会生产力注意不够,使得我们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关系认识的不平衡导致了研究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从山西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明初开始突显出来的人口压力及其由此引发的人口迁移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点。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传统社会,人口的多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用现在的话说,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金元以来山西受战乱影响较小,是一个相对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明初山西人口总数相等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明初大移民。晋水流域在明初也是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再加上大量军屯人口,“洪洞大槐树移民”人口的大量进入,人口和村落都经过了一个接茬换代的过程,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对日后的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从明代开始研究晋水流域的一个时间上的起点。

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历史的两个基本要素,只有“时间隧道”而没有“空间舞台”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的历史。明初晋水流域的历史在空间上也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社会生活的中心由晋阳城时代而变为晋祠时代。晋阳城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太原地区甚至山西的政治军事中心,北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赵光义引汾水、晋水灌晋阳,千年古城毁于一旦。自此以后,太原乃至山西的政治军事中心由汾河西岸转移到汾河东岸。东岸一路是太原府治——山西省会,

① 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西岸一路是太原县——晋源镇，晋水流域由中心走向边缘。明初开始扩建的太原城距离晋水流域近 50 里，民人的眼里那是遥远的“省城”，“县城”晋源也在 10 里开外，至于近在咫尺的古晋阳城，留下来的不过是残垣断壁和乡野传说，晋祠才是晋水流域民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如果说，晋阳城时代晋水流域是一个民族冲突交融的不稳定时代，那么，晋祠时代晋水流域就进入了一个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平稳的时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空间上的重大变化，也是一个区域分期必须参照的重要历史现象。

明清以来的这个“以来”，我以为至少要到 1949 年共和国的成立。这是因为，对晋水流域而言，明清直到共和国成立都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明清虽然两代，但明清易代毕竟与之前的改朝换代没有两样，只有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对晋水流域才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统治晋水流域的 38 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地“改天换地”。从传统中国历史分期的时段来看，本研究跨越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但对晋水流域而言，它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当然，历史一定是延续的河流，共和国成立后晋水流域的历史，我们也不会完全避而不谈，一切视研究对象发展变迁的实际来取舍。

二

为什么“以水为中心”？以水为中心，首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晋水流域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晋水流域即以晋祠难老泉为中心、方圆十数里的泉水流域，历史时期包括 36 个自然村，也就是 36 个自然村曾经利用晋水从事生产、生活活动。晋水灌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宋代规模进一步扩大，明清争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水案明显增多，官府、村落、商人、士绅、宗族、民人均卷入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的增多。晋祠由于晋水而闻名，流域由于晋水而发展。晋水不仅支撑了千年以来“晋祠大米”的生产，而且因水衍生出水磨业、造纸业及区域特色的莲藕、豆腐、制席等产业。以晋祠“以水为中心”的各种神灵祭祀为中心，流域内形成了不同村落和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各类祭祀活动，“跳油锅捞铜钱”、“三七分水”等传说故事也以水展开。在“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控制水权的晋祠镇及其渠长，要比太原县城里的县太爷来得更加直接。晋水流域东面是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明清以来汾河改道、泛滥都曾给晋水流域带来危

害。晋水流域背靠的西山地区有着“山人”的生产生活节奏,平原的民人不断向西山进发,开矿挖煤,西山的峪水也不时地冲向平原,毁村伤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也是晋水流域的命脉。^①

“以水为中心”,也是我们在多年来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试图从史学理论层面阐释地方社会的一个努力。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广泛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已蔚然成风,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从黄宗智的“过密化”到杜赞奇的“内卷化”,林林总总五彩缤纷,无论我们将这些理论称作宏观、中观、微观,都对社会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学者是否可以从中国研究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问题、中国材料、中国视角出发,既有自己的理论关怀,也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呢?我们认为“以水为中心”可以是一种既非现代性宏大叙事,亦非地区性事物简单陈列,而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理论框架。我们知道,从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一直到现代社会,土地始终是生产资料的重要要素,传统史学研究中,土地所有制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甚至是牵涉中国封建社会何以漫长乃至牵涉中国历史分期的重要问题。其实,水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度,在一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国度,无论是丰水区,还是缺水区,水都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利用水、分配水、使用水、管理水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它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重大问题,更是地方社会万千民众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水利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也是地方社会构成的重要渠道,水到渠成,水到之处也会形成不同利益的不同群体,不同群体都在“以水为中心”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以水为中心”可以作为一条线索探讨区域社会全面的历史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也可以勾连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实在也是一种形式上属“区域”而实质上为整体的“全面的历史”。

“以水为中心”,也可以从晋水本身的流量和管理等方面作为线索,进而勾连晋水流域的历史变迁。宋代确立“三七分水”基本制度后,晋水灌溉面积达到六百余顷的历史最高纪录。明代开始,随着流域人口的增加,水利管理制度更加严密,清代“利愈薄,而其法愈密”。民国以后,灌溉面积进一步缩小,建国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更是每况愈下,直至断流。明清以来晋水流量的减少与灌田面积的减少用水制度的严密自然成正比,水稻生产及其相关的水利产业呈现

① 参见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4期;《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史林》2006年2期。

日渐衰败之势，从商风气弥漫及商业人口增多，西山环境恶化，甚至传统的风俗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都与晋水的流动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

三

为什么是晋水流域？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首先是一个区域的研究，对具体研究对象“区域”的界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有不同的解释，也提出过不同的划分标准，但我们认为，区域社会史意义上的区域，应当“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标准”。^① 区域并无大小之分，布罗代尔研究的地中海是一个区域，勒华拉杜里研究的山村蒙塔尤也是一个区域，华北、长江三角洲是区域，山西、晋水流域也是区域。其实，晋水流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的共同体，36个受益村庄都有明显的“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而晋水本身是赋予这种相近性的重要因素。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又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具体的区域，还要有跨出区域本身的眼光，也要有这样的意识。研究晋水流域的社会史，除36村外，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西山地区、太原盆地、古晋阳城、太原县、省会太原，甚至中央政府、英国、美国的脉动与变迁，这就是一种试图突破区域本身的整体全面的社会史的努力。

选择晋水流域也是我多年来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个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向，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趋向。社会史与人类学“优先对话”，是西方社会史研究历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史追求跨学科方法的必由之路。历史人类学，或者说是“人类学化的历史学”、“人类学式的史学”，不仅提供了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前景，“定向的个案研究、空间有限的野外考察、深描法、对日常实践或礼俗具有保持世界图形功能进行的分析以及与人类学和文化理论传统的联系”^②，都在丰富着我们的实践。重要的是，走向田野使我们对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研究对象有了更多“同情的了解”，对文献资

① 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兼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瑞士]雅各布·坦纳著，白锡堃译：《历史人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料有了更为通达的读解。从事区域社会史课题的研究,要从小区域角度观察大的社会历史变动,往往面对的是更多的“地方性知识”,田野工作帮助我们去沟通,去认识,还会帮助我们检验那些已经印在纸上的文献的价值与真伪。社会史要走出传统史学仅仅从文本出发的局限,我们不仅仅是只会在学校和图书馆待着的伏案工作者,我们应该成为走进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的“赤脚史学家”。晋水流域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笔者之所以将晋水流域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其实也是处于长期以来对该区域的关注甚至是热爱。30年以前,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参观晋祠,便被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琳琅满目的古迹所吸引。1980年代初期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乔志强先生的指导下,毗邻晋祠的赤桥村名士刘大鹏渐渐进入我的学习和研究视野,从抄写摘录刘氏连续51年的《退想斋日记》中所谓“有关社会史的资料”,到无数次地走进晋祠和赤桥,从引用《退想斋日记》到以此做相关研究,晋水流域都成为我研究甚至生活中不可离弃的地方。1990年代末开始,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驱动下,晋祠及赤桥又成为我们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重要试点。2001年开始,我们还与欧洲联盟共同体的有关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了“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前景——赤桥计划”。近年来我也写了几篇有关刘大鹏和晋水流域的学术论文。有时想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乔志强先生当年首先注意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并开展相关研究,30年后晋水流域又成为我的学术兴趣所在,冥冥之中何以牵连?

于是,我准备写一本晋水流域的社会史。

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

——以晋中、晋南为中心的考察

邱仲麟*

前言

在明清华北各省当中,山西是重要的森林覆盖之区。而其境内的诸多山脉,如洪涛山、恒山、太行山、五台山、系舟山、中岳山、云中山、芦芽山、吕梁山、中条山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半呈震旦走向,由东北往西南斜行。这样的走向与来自海上的季风,正好呈直角交叉,云气受到山岭阻挡,蕴含的水气就此降下,有利于各山森林的生长。

然而,由于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农业发展与土地开发甚早,故在明清以前,各山脉的森林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砍伐。如唐朝初年,武士夔(559—635)以伐木致富,伐木地就在文水上游的吕梁山。五代时,李存勖(885—926)重修晋阳城与晋阳宫时,也在太原城东北的瓜地沟一带采大柁木。^①北宋初年,因河北诸郡修建城池、仓库及制造兵器,朝廷曾命兵士于林县附近的太行山砍伐木材。端拱元年(988),于林县的礞阳城设置采造务,于淇水以北设置双泉务,每年春二月至冬十月采伐,十一月至正月天寒罢役。礞阳务采木于林虑北山,顺着漳水,汇入洺水,到达冀州。双泉务则采木于林虑南山,顺着淇水,

* 邱仲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国科会”计划“垦山与伐木: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NSC 95-2411-H-001-044)的成果之一。2007年10月,笔者为执行此计划,与好友胡英泽博士一道考察太行山、恒山及管涔山,并在其陪同下,至翟旺先生府上,向其请教相关问题,且蒙翟先生赐赠已出版的五本专书。2010年8月,笔者再至山西,始知翟先生已于去年过世,思之颇感怆然,谨志此以为纪念!

① 翟旺等:《太原森林与生态史》,山西省社会科学院,1999年,第105页。

到达雄州、霸州。^① 皇佑年间(1049—1053),亦“岁取河东木植数万上供”。^② 宣和元年(1119),朝廷为营造宫殿,伐木于吕梁山,时值夏五月,久旱而川流涸竭,“修楠巨梓积于汾之境内者,不啻数万计”。汾州知军事周炜颇为焦急,遂前往润济侯祠祝祷。翌日大雨,“绵延浹旬,一川澎湃,汹汹然若拥千兵万马”。于是大木之“圆若楹者、方若枅者,曹杂而相依;若撩者,乔杰而持出;若栋与梁者,结桴抚筏,首尾相衔,属邑宴然,不劳而办”,皆得顺流而下。^③

金朝末年,亦曾砍伐汾河流域的森林。据《金史》记载:李晏任中牟县令时,适逢海陵帝(1122—1161)营建汴京,以黄河运木,令李晏负责此事。由于木筏经过三门峡之险,前后失败者甚众,李晏乃驰报行台,将木材散投入水中,使工人于下游捞取,“人皆便之”。^④ 其后采伐并未间断,由于采伐数字甚大,故赵秉文(1159—1232)《芦芽山》诗有“万筏下河汾”之语。^⑤ 蒙古攻下山西之后,也在太原设置采木司,如袁湘(1195—1253)之子袁克良,就曾任提举太原采木司之职。^⑥ 元世祖至元初年,全真教靖应真人姜信,请命重修平阳城南之尧帝庙,朝廷曾命太原木场给予官材二万根,但姜信推辞不受。^⑦ 元朝在此设置采木司与木场,自然与附近山区的森林还算茂密有关。《大元一统志》记载太原路交城县的文谷水,就提到“孝文山之材木,结筏浮泛而出,循流入汾水,远近利之”。^⑧

关于明清时期山西的森林砍伐,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数十年前,史念海先生(1912—2001)考察历史上黄土高原的森林变迁时曾指出,明清黄河中游的森林遭到摧毁性的破坏,其中在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北部的森林破坏尤为严重。^⑨ 其后,关于山西森林史的研究,应以翟旺先生(1932—2009)的贡献最大,翟先生长期从事山西林业工作,在工作之余逐字抄录地方志等史料,先后完成山西森林

① (明)崔铎纂修:《彰德府志》,卷2,《地理·林县·礪阳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5—1999年,史部第184册,第366页。

② (宋)韩忠彦:《忠献韩魏王家传》,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1册,卷4,第692页。

③ (宋)周炜:《润济侯记》,见(明)李侃、胡濙纂修:成化《山西通志》,卷14,《集文·坛庙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第540页。

④ (元)脱脱等撰,傅乐焕、张政烺点校:《金史》,卷96,《李晏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125页。

⑤ (金)赵秉文:《芦芽山》,《闲闲老人滹水文集》,卷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80页。

⑥ (元)姚燧:《袁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0页。

⑦ (元)王盘:《重建尧帝庙碑》,见成化《山西通志》,卷14,《集文·坛庙类》,第503页。

⑧ (元)李兰胥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北之地·太原路·山川》,中华书局,1966年,第116页。

⑨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第283—285、287—290、294—295、303—305页。

史专书达七种,其引述史料之多实属空前。^①而关于山西的护林碑,则以何满红的研究最具开创性。^②除此之外,亦有其他学者讨论相关的问题^③,但笔者所掌握或许尚有缺漏。

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大约是北纬 38 度以南的区域^④,其山系有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和太行山的南半段。至于行政辖区方面,明代属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及汾州(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四直隶州地域。清代划分愈细,则属太原府、汾州府、隰州、霍州、平阳府、绛州、蒲州、解州、泽州府、潞安府、沁州、辽州、平定州。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考察明清山西森林变迁的过程中,受惠于翟旺先生的著作甚多,本文所参考的若干史料,即透过其著作之引领而来。实际上,此文所涉及的诸多层面与论点,前人已多谈过或点出,以下所述虽在资料上有所补充,但或许仅系狗尾续貂,聊具补缀之功罢了。

一、山地开发与水土流失

明中叶以降,大约在 15 世纪末起,百姓大量涌向边区山区开垦,甚至采取焚山开田的方式,造成禁山的森林大量消失。^⑤而这种大量往山区开发的情况,在太原盆地一带亦不例外,而随着山田垦殖日盛,连带也衍生出其他生态性的恶果。16 世纪初,太原府祁县的山林,就因垦田而被大量砍伐,随之而来的是水土

① 除了前面已引到的《太原森林与生态史》之外,还有翟旺:《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年;《管涔山林区森林与生态变迁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年;《太岳山区森林与生态简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年;《雁北森林与生态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五台山区森林与生态史》,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年;《山西森林与生态史》,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年。

② 何满红:《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文史月刊》2007 年第 1 期,第 59—64 页。

③ 如郭涛:《明代学者阎绳芳论山西祁县的水土流失》,《中国水土保持》1990 年第 1 期,第 51—52 页。梁四宝:《明清晋陕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中国水土保持》1990 年第 6 期,第 50—52 页。苏泽龙:《明清时期文峪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与环境变迁——以山西省交城县方志为中心的解读》,《中国地方志》2007 年第 6 期,第 43—47 页。此外,亦有若干通史性质的专书,谈及明清山西的生态环境变迁,如:徐月文主编:《山西经济开发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年,第 240—241 页。黎风编著:《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 年,第 133—139 页。但其所论相当简略,虽跨越明清两代,却无从得知森林变迁的趋势与地域性。

④ 关于北纬 38 度线以北的区域,笔者已另撰《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一文,刊载于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 4 卷。

⑤ 邱仲麟:《国防线上:明代长城沿边的森林砍伐与人工造林》,《明代研究》2005 年第 8 辑,第 37—48 页。